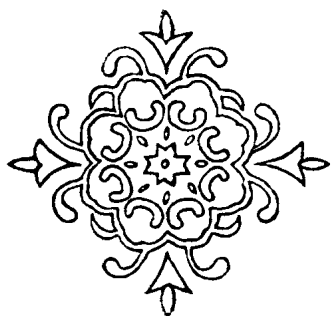


张国光点校

金聖嘆批才子古文



张 国 光 点 校



金聖嘆批才子古文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序平 孙天赦

封面设计：汪廉诚

封面题字：孔可立

金圣叹批才子古文

张国光 点校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书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蒲圻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75印张 5插页 347,000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0106·915 定价：4.85元

〔照排胶印〕

# 前 言

张国光

在我国如果要问有哪一种古代散文选本流传最广、阅读的人最多的话，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当然是《古文观止》。诚然，这个选本从十七世纪末（康熙中）问世以来，就不断有人翻刻。建国后，包括中华书局在内的一些出版社还相继加以校印，并有专家撰写文章予以评介。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这部三百年来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古文观止》中的大部分文章，却是转录自在它之前三、四十年由文学评论家金圣叹（1608——1661）评选的《才子必读古文》。《古文观止》选编的绝大部分文章与《才子古文》雷同不说，这个选本中的许多思想性较强，艺术分析较为细致精到的评语，往往也是从《才子古文》抄过来的。而由于《古文观止》的编选者吴楚材和吴调侯的封建正统思想严重和艺术欣赏水平较低，他们在抄录金本时又往往排斥了一些思想性较强的篇章，塞进了一些封建色彩较浓的篇章；还有意无意地把金批中富于民主性、批判性的内容加以删削，而把一些磨去了锋芒棱角的、不痛不痒或含混不清的批语硬与金批嵌合在一起。这何异狗尾续貂，鱼目混珠！读了金批的这个选本之后，这个问题是不难看清了。

## （一） 金圣叹评点《才子 必读古文》的始末

金圣叹在二、三十岁时就订了一个评点“六才子书”的计划。所谓“六才子书”就是六部古典文学名著。“才子”在当时本指

有才华的文人，而金圣叹则改变它的涵义，把它作为“圣人”的一个代名词。他称：“才子者，菩萨也，真能致知格物者也。”就是说，才子并不比圣人逊色。他选“才子书”时只选六种，就是主张用这六部古典文学名著来代替儒家的“六经”作为童蒙课本、群众读物。所谓“六才子”就是指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施耐庵、王实甫。所谓“六才子书”就是指《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但他最先着手批点的却不是第一、二、三、四才子书，而是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他大约在崇祯十一、二年着手批点而到十四年二月刻成此书。如果我们不否认金批《第五才子书》，是一部成功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斗争的优秀长篇小说，就得承认金圣叹在明末农民起义接近高潮的历史时刻批刻这部书，是含有深刻的用意的。紧接着，在一六四四年，明朝的大厦即毁于农民起义的烈火。翌年，清兵南下，金圣叹的家乡苏州一带饱尝了兵燹之祸。之后，由于贫病交迫，金圣叹的批点计划不能不受到影响。似乎直到顺治十四、五年，他才完成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批点，接着又批点了唐人七言律诗。除此之外，他零散地批点的《左传》、《孟子》的篇段，以及《古诗十九首》等，都编入了《唱经堂才子书汇稿》，这是人们所易见到的。但他还批点了一本古代散文，则很少为近人所知。他在其《西厢记·读法》中写道：

仆者因儿子及甥侄辈要他做得好文字，曾将《左传》、《国策》、《庄》、《骚》、《公》、《谷》、《史》、《汉》、韩、柳、三苏等书杂撰一百余篇，依张侗初先生《必读古文》旧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读书》，盖致望读者之必为才子也。久欲刻布请正，苦因丧乱，家贫无资，至今未就。今既呈得《西厢记》，便亦不复念之矣。

说明他评选古文时间较早，后因乙酉丧乱，他的家境更为困顿，

以致多年未能出版。金圣叹不仅是一位敢于歌颂农民起义的民主思想家，而且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因此，在一六六一年顺治帝死去的“国丧”期间，发动和组织了吴县士民的“抗粮哭庙”活动。随之，于这一年七月被清朝杀害于南京。其家被抄，其独子——曾协助他完成唐人律诗评点的金雍，也被充军辽阳。身后幸得他的族兄金昌为他刻印了《唱经堂才子书汇稿》。我们从《汇稿》书前开列的《唱经堂外书总目》中，知道《唱经堂外书》共四种：《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书》和《必读才子书》均已刻过。《必读才子书》当然就是《必读古文》。它能够在金圣叹生前出版，显然是由于朋友们支援经费的结果。顺治己亥（十六年）春，金昌写了《才子书小引》，指出金圣叹著述不少，凡涉其（指金圣叹）手者，“实皆世人之所并未得见者也”。而金圣叹既“贫无财”，又不肯“与坊之人刻行”，因此只好请同学们帮助刊行。大约就在这之后，金圣叹就把他原来的古文选本加以甄别和补充，定名为《必读才子书》刻行了。

现在我们读到的这部《必读才子书》共选了一百五十二篇（段）文章，但其中并未选录《公羊传》、《谷梁传》、《庄子》、《离骚》的篇（段）。这说明金圣叹在所评《西厢记》出版后，曾对原来的古文选本作了较大的补充，并对原来的内容作了一些更动。

## （二） 后来居下——《古文观止》对 《才子古文》的抄袭和窜改

《才子古文》共十六卷（其第十六卷称为“卷末”）。按周、秦、汉、晋、唐、宋顺序排列（末卷系补遗）。《古文观止》分十二卷，选文仅二百二十篇，除明文十八篇系新选的和从《公羊传》、《谷梁传》、《礼·檀弓》选的十一篇为《才子古文》所未录以外，其选篇大部分与《才子古文》相同，而且不少评语，都是直接抄袭金批的。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观止》有意删去了

金本的一些思想性强的选篇，并删略了他的许多不符合封建正统思想和对清朝有影射的评语。兹发其覆如下：

—

《古文观止》删削《才子古文》中富有民主性的篇章。如《才子古文》在“秦文”部分选了《国策·张耳、陈余说诸县豪杰》一篇，金圣叹并在总批中十分激动地写道：

一段极写秦毒之深，一段极写陈王倡义之响应，然后一段鼓励诸县豪杰。其笔一低一昂，使读者至今尚欲推案大呼而起！

又尾批云：

笔态顿挫激昂，早有前歌后舞之乐。

但是，《观止》却断然把附有这样的批语的名篇砍掉了。

又如苏轼的《武王论》提出了批判武王兼及成汤的命题，在当时无疑是惊人之笔。金圣叹显然喜爱此文，因而加以选评。他在总批中指出：此文是“惊人之论”，又谓：“武王非圣人也”一语，“劈空落大笔，发怪论，不怕天雷，不怕王法，妙妙！”又批“昔者孔子盖罪汤武”语云：“上只大书六字一句，下便忙请孔子自解，妙妙！”这就是说，写这类文章要善于用些“保护色”，以孔子之矛，攻孟子之盾。借以“证己骂武王不背于孔子”。尽管“古文观止”选苏轼作品多至十七篇，但独独不录《武王论》，显然是由于视此文为“恣肆”的“怪论”之故。

金圣叹是一个鼓吹暴力反抗的激进思想家，他批点《水浒传》对农民起义军反对封建王朝的壮举十分赞赏，并大加渲染，他选《才子古文》有意选了《史记》的《刺客列传赞》，并总批云：这五个刺客“或成或不成，笔意盖注或不成也。五人中，独惜荆

轲甚至！”明说《刺客列传》是为了突出刺秦始皇的荆轲而作，并为他的失败而深表遗憾。又批：“世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云：“吾正恨荆轲何故必欲生劫秦皇，乃古人亦已先惜之耶？史公却不欲附会。”这明是说荆轲对秦始皇不应存有幻想而采取“生劫”方式，以致其功不成。又批“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一段云：“只重立意不欺，不重成不成。妙妙！”这无疑是要读者勿以成败论反抗强权的英雄。《古文观止》不选《刺客列传》，自不难理解。

柳宗元的《送薛存义序》是一篇富有鲜明的民主意义的文章，金圣叹是大加推崇的。他称它“便如孔子之一部《春秋》”。柳文云：“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金批：“极奇，极正，极径，极曲。”又评“凡民之食于上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云：“古初设官之故，说出慨然！”这样的文章，显然也不合乎封建正统观而未被收入《古文观止》。

又如萧望之的《入粟赎罪议》被金圣叹称为“不惟通达治体，又最通达人情”，他评萧文“民阳故有仁义之心，民阴故有欲利之心，二者并函于心”语云：“如此说方是圣贤语不是头巾语。”萧云：“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金批：“说尧桀不能有加于民，真是十成透语”。这样深刻的见地，当然不会引起《古文观止》选编者的共鸣，因而摒之不录。

北宋欧阳修不仅是古文运动的领袖、诗人和词人，而且还是一位史学家和经学家，他的《春秋或问》能突破汉唐经师的藩篱，运用较为科学的方法，研究《春秋》这部儒家的经典。金圣叹是要学司马迁那样借用比附《春秋》来抬高自己的著述的地位的，因此他对欧阳修的观点有保留，故批此文云：“《春秋》始终，设果无义，则游、夏二子何至一辞莫赞？其事甚大、甚深，且姑存而俟之。”但他却非常称赞欧阳修反传统、反独断的治学精神。欧阳文云：“或问春秋何为始于隐公而终于获麟？曰吾不知也！”金批：“妙妙，读书第一高眼，著论第一高手”，因此，才敢把《春

秋》之始于隐公和终于获麟，都“说得雪淡平常”。又盛赞欧阳所谓“义在《春秋》，不在起止”的观点，是“真正第一眼、第一手。”《古文观止》编者的主导思想自然和这种思想格格不入，因而欧阳修此文也未被选入。

《古文观止》十分推崇韩愈，故选韩文多达廿四篇，而选柳文只十一篇。金圣叹则能从柳宗元在世界观上远比韩愈进步这一点出发，公开地扬柳抑韩。我们看金圣叹的选本中的欧阳修所作的《读李翱文》一文，其中竟有这样一段话：“况乃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羨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耳。推是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金批云：“意思欲抬李，却不顾捺韩至此。”不问可知，欧阳此文也是不能入《古文观止》之选的。

金圣叹是一个具有深沉的民族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点，在《才子古文》的选篇和批语中也有流露。象苏洵的《送石昌言为北使引》就是作者爱国思想的体现。他写道：“凡虏所以夸耀中国者，多此类也。中国之人不测也，故或至于震惧而失辞，以为夷狄笑。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就是说：辽朝是虚张声势，要石昌言不为威屈，不畏恫吓。而金圣叹批云：“老泉胆识如此！”这就间接说明了他对清王朝是蔑视的。

我们知道金圣叹对封建帝王是很少好评的，他批《史记》也总是站在司马迁一边，深刻暴露汉武帝。可是他在《才子古文》中却选了《高祖本纪赞》并总批云：“推崇汉家，其学甚醇，谓史公不知道，岂其然哉？”又批：此赞“推崇昭代之意，只四字便尽，岂后来纷纷符讖之云乎？”他又选批《魏世家赞》云：“此明明高推汉受天命，非过许虎狼之秦也！”这个“虎狼之秦”究何所指，不是指的清王朝吗？再看他对班彪《王命论》的批语：“总断尧、舜、禹、汤、文、武以至汉兴”：“极写高祖，所谓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也。”用意亦不难揣度。再看《古文观止》对以上借以倾吐民族思想的文字全都不选，就可见它的选编者如何屈服于清统治者的淫威了。

## 二

此外，有些富于民主性的篇章，虽然《古文观止》保存下来了，但金圣叹高度评价这样的篇章的批语则被大加删削，因而失去了原有的光彩。例如对《左传·晏子不死君难》一文，金圣叹的总批云：“注眼看定‘社稷’二字，便于君臣生死之际，处之夷然自如。此本严毅之论，而出之以犹夷之调，最是脱俗文字。”又批：晏子的“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云：“陵，居其上也。妙言，至言！”。又批晏子“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二语云：“口，禄也。妙言，至言！一眼只注社稷也。”晏子说“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一段，金圣叹极口赞云：“斩斩截截，磊磊落落。此等文字，与日月争光可也！”但《古文观止》只在总批中抄了“注眼看着社稷，于君臣死生之际”二语，而赘以“乃有定策”四字，简直是不通。《观止》的批者不仅不同意金圣叹称晏子“不死君难”诸语“可与日月争光”，甚至连金批中“斩截”、“历落”、“妙言至言”的批语，也看不顺眼而略去不提，这就可以看出他们和金圣叹的思想距离，何其遥远？

《国语·召公谏厉王弭谤》一段，这也是一篇有名的鼓吹给人民以一定的言论自由的文章。金圣叹热情地批道：“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隰。……后贤务须逐番细读之。真乃精奇无比之文，不得止作老生常诵习而已。”又批：“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二语，“说谤之可宝如此，真是精奇无比！”可是《古文观止》中此文的总批则只称它“笔意纵横，不可端倪”而已，又把金圣叹斥厉王的话是“大愚人语”一句改为“痴人声口如画”。且在此文的所有夹批中均不见“精奇无比”字样，这就可见《观止》的艺术趣味了。

对于金本批中大胆暴露封建统治者和愤世嫉俗的言论，《古文观止》评者也多认为不合“温柔敦厚”的古训，因而要设法磨去它的锋芒，削弱它的批判性。例如金圣叹批《左传·郑伯

克段于鄢》一文：“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云：“一‘遂’字，写恶得无理。”又批“爱共叔段，欲立之”云：“妇人率性，往往遂成家国之祸，如此类甚多。”这显然是对顺治前期朝政的影射。无怪《观止》的评语，只是就事论事，评“武姜爱恶之偏”，而不敢作联系实际之想。

由此我们也可以想到，金本之所以选《国语》“鲁敬姜不预闻朝政及家政”，是有深意的。敬姜说无论是“外朝”“内朝”，“皆非吾所敢言也”。金圣叹批云：“‘皆’字妙，不惟官职不敢言，虽家政亦不敢言。后世太后临朝，岂知前古先有如此龟鉴。”其讽刺清王朝的意味十分明显，无怪《古文观止》不收此文了。

金圣叹强烈反对封建暴政，因而对《史记·商君列传赞》选批：“史公恨商君，并恨其书！”又批《酷吏列传》：“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云：“下‘胜任’字已可恨，又下‘愉快’字，写尽秦吏治之惨酷！”但《古文观止》则评此语云：“此时非酷吏救止，安能偷少顷之快？”这就把司马迁的反话，说成对汉武帝重用酷吏的肯定了。

司马迁的《史记》明是发愤之作，以致曾被指目为“谤书”，但是，《史记·自序》却把此书的撰作的目的写得冠冕堂皇。他借壶遂之口问：“夫子所论，欲以何明？”金圣叹批云：“再反复”；“必须反复，不然后来终是被人点检。”意即需要再加一层“保护色”，以免被人揭发。又批：“《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云：“此言《春秋》与众经一体，俱为至纯厚、至隆盛之书，先非刺讥之文。”但《古文观止》的批语则是：“言《春秋》与诸经同义，皆纯厚隆盛之书，非刺讥之文，极得宣尼作《春秋》微意。”竟把司马迁的饰词，当作符合实际的话，真是肤浅之见。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向即将临刑的知己倾吐内心的愤激之作。金圣叹抓住这篇文章的精髓，一而再、再而三地批云：司马迁“独缕缕切恨官刑！”但《古文观止》连一句这样的批语也没有。

司马迁的外甥杨恽因为写了《报孙会宗书》而被腰斩，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对于这封信，金圣叹总评云：“愤口放言

不必又道，其萧森历落，真为太史公妙甥！”又迭批：“愤口放言”，“尽是愤口放言”，“皆放言胸臆也”，“一发愤绝！”但他却是完全赞同杨恽这样写，故批杨文“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云：“愤口放言，意色甚恶，然自是妙文！”又批“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云：“借喻不伦，然愤口时有此等语”。而《古文观止》则在“不知其不可也”下批云：“满纸不可人意”。又迭批：“纯是怨望”，“何谩骂至此？”“含讥带峭，恽之得祸在此。”简直是认为杨恽“咎由自取”。尤其错误的是竟在总批中说什么：“宣帝处恽，不以戴长乐所告事，而以报会宗一书；异哉，帝之失刑也！”这岂不是说杨恽本该腰斩，不过不应坐以报孙会宗一书耳。何荒谬至此耶？

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一篇主张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和平、团结政策，反对一切诉诸武力、以残杀为唯一手段的文章，它表面上批判秦汉，而实际上是指的唐朝（当然李华对唐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的看法有些片面性），所以金圣叹批云：“看他迭迭只怨秦汉，即近代不言可知。”又批：“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云：“怨之至，怒之至，不嫌出于诅矣！”就是有意把作者对封建王朝的怨望情绪，提高到愤怒以至公开咒诅的尖锐程度，而《古文观止》仅抄录了“迭迭只怨秦汉，即近代不言可知”二语，其总批则云：“写得愁惨悲哀，不堪再诵。”仅把此文作为哀怨之作而不承认它是一篇对封建统治者的控诉状。

### 三

也有许多古代散文名篇，《才子古文》选了，《古文观止》也选了。后者也抄了前者的许多评语，但就其评论的整个风貌而论，两者却有显著的差别。总的来说：金批是富有个性的，他敢于联系实际，而又认识深刻，笔锋犀利，因之很能给读者以启发。而《观止》的评语，往往是陈词老调，苍白无力。有时它虽然照抄了若干金批，但为了掩其抄袭之迹，又不得不“自出心裁”加以窜改，所以《观止》的评语，有时竟使人不知所云。例如金圣

叹为了辩明李陵《答苏武书》之非伪托，批云：

相其笔墨之际，真是盖世英杰之士，身被至痛，啣之甚深，一旦更不能自含忍，于是开喉放声，平吐一畅。看其段段精神，笔笔飞舞，除少卿自己实乃更无余人可以代笔，昔人或疑其伪作，此大非也。

尽管他这个结论难以成立，但其文字却富有何等气势！何等笔力！无形中就能慑服读者，而《古文观止》则总批云：“文情感愤壮烈，几于动风雨而泣鬼神……更无余人可以代作。苏子瞻谓齐梁小儿为之，未免大言欺人。”殊嫌平庸无力。

又如柳宗元的《书箕子庙碑阴》本是一篇寓有很深哲理的文章，而金圣叹又有意通过批点此文寄托其以保存和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潜在意识，因而写下了一些半吞半吐、闪烁其词的批语。他不仅在此文的“保其明哲，与之俯仰”，“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诸语之下，四批：“写箕子入微。”又批：“于虜（呜呼）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其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一段云：“上段正文已毕，忽然别起波浪，使人失声长痛！”试问一般的读者，读此文何致于悲愤到这样的程度？这明是易代之后身受清王朝压迫的金圣叹的特有的民族情绪的曲折反映。所谓“人事之或然”者，不就是金圣叹对以郑成功、张煌言为代表的晚明恢复力量的向往的潜在意识吗？自然《古文观止》中不会有这样的感情，可是他们却也依样画葫芦，在“其有志于斯乎”文下批：“忽然别起波浪，语极淋漓感慨，使人失声长恸！”未免使人茫然不知所谓。

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金圣叹总评前赋云：

游赤壁受用现今无边风月乃是此老一生本领，却因

平平写不出来，故特借洞箫呜咽，忽然从曹公发议，然后接口一句喝倒，痛陈其胸前一片空阔了悟，妙甚！

而《古文观止》则把这段评语改为：

欲写受用当现前无边风月，却借吹洞箫者发出一段悲感。然后痛陈其胸前一边空阔了悟，风月不死，先生不亡也。

两相比较，优劣自见。对《后赤壁赋》，《古文观止》的批语“岂惟无鹤、无道士、并无鱼、并无酒、并无赤壁，只有一片光明空阔”，是照抄金批不必说，但此书把金圣叹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句下的“人间世时时有此”的批语改为“写出萧瑟景况”却不合适，因为金圣叹以“风起水涌”喻人世变乱，所以又在“余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语下批云：“先生亦不能不知难而退也”。而《观止》既改了前面的批语，却又照抄后面的批语不改。这不正说它的选编者竟是一个拙劣的文抄公么！

### （三）《才子古文》保存了金圣叹对《史记》的真知灼见

金圣叹把《史记》列为六才子书之一，又在《水浒》和《西厢》评中多次赞扬司马迁的文笔，可惜他并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史记》评本，但是《才子古文》中却保存了他评选的《史记》序赞九十余篇（有几篇只抄了原文，未加评语）。我们知道：司马迁不是客观主义地对待修史的任务，而是站在同情人民、反对残暴的封建统治的立场来写《史记》的，因而大力表彰了历史上的明君贤相，而鞭撻了许多暴君酷吏。他对于秦二世、赵高这样的暴君和奸臣，对于迷信神仙和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汉武帝，以及武帝重用的酷吏，都是尽情地揭露的。对于我国第一个农民起

义领袖陈胜和为人民抱不平的游侠，他是称道的。对于爱国人物、文学家、思想家和科技家及一切受迫害的正派人士，他都是尊重的。他的那些写得成功的传记，字里行间都表现了自己鲜明的倾向性。古代的史家很多，为什么独独司马迁能够在史书中流露如此丰富的感情，甚至敢于对当朝的皇帝这样大胆的揭露呢？这正如鲁迅所说，是“发愤著书，意旨自激”。而金圣叹之评《史记》正是牢牢地抓住了一个“愤”字，他总批《平原君、虞卿列传赞》云：“末‘穷愁著书’另宕一句，乃写自家意思。”又批“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二句云：“另出一笔，为自家吐气耳。”又谓西汉“田叔本不足立传”，司马迁特与立传，只为救孟舒一节，略与史公救李陵同，故特地借来自吐垒块。”（《田叔列传赞》批语）又批《魏豹、彭越列传赞》：“智略绝人，独患无身”云：“哀哉！如此痛声，便是史公自己生平不曾告人之至深里言也！故写得特地加倍曲折秣至。”

司马迁每每借写历史上暂时忍受屈辱而最后终能大有作为、一雪前耻的人物，作为自己的榜样，抒发自己“隐忍以就功名”的思想，金圣叹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故批《伍子胥列传赞》云：

“一叹怨毒于人最甚。”

“再叹乞食人有心事。”

“再叹隐忍是烈丈夫。”

“再叹不隐忍人无用。”

又批《越王勾践世家赞》云：“极赞勾践，是史公心喜此一辈人物”、“何与乎勾践？与其能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但他又指出司马迁并不是一个只提倡苟且偷生的人，故在《季布、栾布列传赞》批中，强调此文乃是“贤者必自重其死。又有时不自重其死二意”，并谓：“史公凡于人隐忍不死时，必留连不置口，却从不曾说到死又实不足重一意。故知此赞是其得意煞时。”

尤为可贵的是金圣叹能够从关心人民疾苦的立场阐释《史记》的进步意义，这样就不致于把司马迁的怨愤仅仅理解为个人的冤抑，如他批《蒙恬列传赞》云：“史公之痛恨轻百姓力如此。又

是得之目击，故尤切齿！”他认为司马迁是儒家仁政爱民思想的膺服者，是孔子的真正信徒，故评《孔子世家赞》云：“赞孔子，又别作异样淋漓之笔。一若想之不尽、说之不尽也者，所谓观海难言也。”儒家反对残民以逞，故金圣叹批《循吏列传赞》云：

“史公真是本论，便与孔子意旨一样。”又赞司马迁所谓的“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二语云：“仁人之言，真乃蔼如！”司马迁在《酷吏列传赞》中痛斥比酷吏还要残暴的一批刽子手“何足数哉？何足数哉？”金批云：“既不足数，又留其名与后人骂！”表现了对这种人强烈的憎恨！

金圣叹富于正义感，故严正地批判背叛师训，出卖灵魂，唯奸臣赵高之命是听的李斯云：“李斯学出荀卿，荀卿出子夏，其知六艺之归，非虚也。乃既为三公，一意持爵禄为阿顺，听高邪说，驯致亡秦。传中纯写赵高事，妙妙！言高之所为，皆李斯听之也。末言，‘不然且与周召列’，岂非为子夏门墙致痛耶？”（《李斯列传赞》批）可谓深悟司马迁的用心。

金圣叹批《水浒》极不满宋江之权诈，这是因为他生性素来慧直、率性而行之故，因此批《张仪列传赞》云：“骂张仪，并骂三晋之人，史公之恶权变强秦之士至矣！”又批《樗里子、甘茂列传赞》中“叹秦时尤趋谋诈”一语云：“只一‘尤’字，便是骂尽天下尽趋谋诈也。”

对于听信谗言残害忠良的昏主，金圣叹也表示了深恶痛绝的态度，故批《赵世家赞》云：“史公深恶迁之信谗杀李牧。故特地暴扬其母之丑，以当痛棒苦治也。”

明清研究《史记》的文人中，金圣叹是对《史记》的讽刺笔法理解得最深切，阐释得最透辟的一位。他批《匈奴列传赞》云：“史公不喜武帝穷兵匈奴，然又不敢深论，故特地一笔出，一笔入”。所谓“一笔出，一笔入”即用时隐时显，又茹又吐的方式揭露封建统治者阴险狡诈与残酷的本质。这也就是他在《水浒》批中所称道的“叙事微而用笔著”的手法。

司马迁写《淮阴侯列传》对韩信因功高震主而受戮，充满着

深刻的同情，这一点金圣叹可说是洞悉无遗，并且深有同感的。因此他批《淮阴侯列传赞》云：“史公极贵学道，如此判淮阴不学道，我欲泪下！”实际是说司马迁对韩信爱之深不免责之切耳。

由于司马迁深为被刘邦杀害的韩信不平，所以对萧何、曹参等不无微词。他在《萧相国世家赞》中写道：“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金批云：“此四句十六字，便是碌碌未有奇节人也。有奇节人，正不能尔。”又批“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二语云：“此皆奇节人也，可胜叹息！”言下便见刘邦对“有奇节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能容者仅碌碌之辈耳。金圣叹认为《曹相国世家赞》“一半写战功，一半写相业，俱不甚许曹参”故批“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诸语云：“忽然为淮阴洒泪，大奇！须知此是史公故作之笔。”可谓独具慧眼。《赞》又云“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惟独参擅其名。”金批：前四字“寄慨无穷！”后“十一字句。参清静固胜，只是回想淮阴，泪落多少！”这也说明金圣叹洞察出所谓韩信与陈豨共同谋反一案实是吕雉罗织成的大冤案。

司马迁对于汉武帝宠爱卫青、霍去病也不乏讥刺之笔，而金圣叹恰好看出了作者的用心，故批云：“全传写大将军战功，至《赞》忽补写苏建语，便使人看大将军是另一样气色。”金圣叹也颇不以卫、霍的拒绝延揽人才为然，故在卫青语云：“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和“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语下夹批云：“二将军之以功名终也，不亦宜乎？”这就是说卫、霍之所以受宠，是由于他们善于体会武帝的意旨，一切谨小慎微之故。

在《史记》批文中，金圣叹也常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垒块，例如他批《伯夷列传》就否认它是“史公自抒其愤”之作，以为“此文虽以伯夷名篇，其实乃言自古至今如伯夷其人，正不知有千千万万，只为不曾经孔子大圣之所表彰便老死于水边林下，竟